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首狂飙曲	唐少杰
【乱世悲歌】	北大校友回忆反思文革诗选	舒声选注
【往事非烟】	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	岳瑞民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首狂飙曲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述评

·唐少杰·

50年前的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这一大会成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一个著名事件。本文旨在对这一大会的缘起、过程和影响作一简要述评。

一、缘起

1966年6月上旬，整个文革以及清华文革开始之际，由于毛泽东暂居南方，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及负责文革运动。中共中央以北京市新市委的名义给清华大学派出了一个由528人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进驻清华，接管了清华大学的各级领导职权。6月19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手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清华工作组。工作组带来了三个“直接”：一是直接造成了清华原有的干部体制瘫痪，把上到校长、党委书记，下到每一个基层干部在内的所有清华干部一律统统免职，列入“黑帮”或“黑线”人物，挂了起来。二是直接带来了工作组与以清华工程化学系902班、年仅21岁的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众多激进学生的严重对立，造成了清华园文革初期的严峻形势。在“五十多天”里，工作组把700多名学生或其他人员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或“蒯氏人物”等等，还发生了数起自杀事件以及自杀未遂事件。三是直接给整个文革，给清华文革以及给“工作组模式”带来了某种“政治宿命”。毛泽东1966年8月5日所写的近250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根据清华文革的上述经历而拉开了文革整治刘少奇、邓小平的帷幕。换言之，基于清华文革伊始的问题，毛泽东对刘少奇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就是为了全面地、彻底地打开文革局面，要把刘少奇的问题逐步引入不归之路。

文革爆发后，如何广泛、深入地开展文革尤其是如何把文革推向全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整治。1966年10月，“无产阶级司令部”（特指文革初期

的中共最高权力领导）正式提出了所谓以刘、邓为代表的镇压群众、阻碍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将进入1967年之际，按照毛泽东在自己73岁生日家宴对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所致的祝酒词“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1967年的文革不仅是进入全国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部委）及其以下地区和单位、部门和机构的夺权，而且必然要伴随着整肃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名为“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实为中共党和国家传统的干部体制和秩序，以确保更大、更广、更深地铺排文革。1966年年底，中共中央有关机构开始对王光美的问题进行专案审查。此时，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划入敌我矛盾。然而，1967年初的文革形势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如何把推进文革群众运动与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问题联系起来。“形势比人强”。这一年年初，文革在全国各地、各单位或各级部门遇到的阻力主要就是刚刚成势的造反派运动与中共党和国家原有的干部势力及其运作机制的矛盾，甚至冲突。因而，加大加重打击刘少奇的力度就是制约文革第二个年头的契机。

“无产阶级司令部”作出了重大举措。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王力、关锋所写的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些文章集中抨击刘少奇，并首次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指名地公开加在刘少奇头上。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他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了却了毛泽东多年想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一个心愿。这篇文章不仅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修改，而且还经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的逐句逐段地讨论和修订。〔2〕毛泽东1967年5月在接见外国来访者时，把戚本禹上述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革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毛泽东认为，文革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标志第四个阶段，亦即“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3〕

在我看来，戚本禹这篇抨击刘少奇的“檄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首次地、公开地、正式地把刘少奇的问题当成了敌我矛盾、敌我斗争。对于清华文革来说，戚本禹的文章不啻是一个全力打击刘少奇的重大政治信号，后两篇文章还促使清华文革掀开了干部问题的盖子，把清华文革伊始的焦点之一，即干部问题公布于天下。总之，把群众运动问题、干部问题同刘少奇、王光美以及工作组联系起来加以促动、深化清华文革，就势在必行；而对清华革命造反派学生们来说，可以大张旗鼓地批斗王光美了。

我个人推断，1967年春初，刘少奇问题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这一年2月16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的“碰头会”（又称“怀仁堂会议”）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一些元老派代表人物对文革新贵的指责和对文革揪斗干部的做法的痛斥，使得毛泽东高度关注此事。他对这些元老们的愤怒和反击意味着他本人把这种会议的争论或斗争看成解决文革胜败或存亡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刘少奇本人与这一在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来被称为“二月抗争”的会议不可能有直接的联系，尽管迄今为止诸多还没有公开发布的档案文献资料等等是否证实这一会议对于刘少奇问题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正是在毛泽东对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些元老派同志的处置之后，刘少奇问题很快恶化就绝不是偶然的了。戚本禹上述那篇“檄文”的“适时”发表，无疑是给文革全局发出的加大加重打击刘少奇及其所谓“资反路线”的一颗信号弹。从毛泽东以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角度来讲，能否大力批判或斗争刘少奇的问题则是关系到文革能否广泛、深入地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

从1966年7月底工作组撤离清华起，清华就不断出现指责刘少奇，批判王光美的呼声和浪潮。从1966年8月20日题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4〕大字报的张贴，到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大会的举行，这里具有文革以及清华文革历史的连续性和必然性。文革伊始深受工作组乃至所谓刘少奇文革主张和文革做法（王光美就是其具体代表）迫害的清华学生们，对于工作组给清华文革所带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上述所带来的三个“直接”，就以批斗王光美的方式来进行一次大张旗鼓、别开生面的报复。

1966年10月初，蒯大富在清华几个红卫兵总部参加的会议上讲，他成立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得到了中央（实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要干两件大事，一是揪斗刘少奇、王光美；二是反对折中主义，后来这被说成是反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折中主义。10月9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八八”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的负责人开会，基于校内一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声，决定批斗王光美。会后，他们去中南海。那天晚上8点，蒯大富带着400人进城，另一些人在清华东大操场等候开会。蒯大富等人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要求周恩来接见，要求批斗王光美，得到的是9点半以后给答复。〔5〕周恩来等接见了蒯大富等清华八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拒绝了这些代表的要求。周恩来说：“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6〕蒯大富等人在中南海西门扎帐篷呆了一夜，次日晨，周恩来派周荣鑫见了蒯大富等人，告知他们周恩来忙，不再见他们了。蒯说：“今天我们来，我也没有打算把王光美揪回学校去。我是想看看给不给。”〔7〕

12月18日，经过张春桥的授意，〔8〕无疑，更加推动了批斗王光美的进程。张春桥对蒯大富所讲的一番话绝不是代表他本人，而是出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策略。19日晚上，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成立“井冈山兵团”，名为“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的大会上，坚决表示“彻底砸烂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该兵团成立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上，蒯大富等就决定继续争取揪斗王光美。在18日公布的“井冈山兵团决议001号”第一条就是要求王光美等人“回清华作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9〕12月25日，蒯大富带领清华大学6000余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近十辆广播宣传车在天安门、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和西单举行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并对王光美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她十天内回清华园作检查。

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唐伟、陈育延、潘剑宏等十余人，他说：“你们提出揪斗王光美，我已请示了主席，毛主席不同意把王光美揪回清华去。”周恩来的建议是让王光美作书面检查。〔10〕周恩来说：“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他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11〕但是，井冈山兵团的某些人没有认同周恩来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实施了所谓“智擒王光美”的行动。〔12〕

1967年3月底4月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所追求的批斗王光美一事才有了转机。蒯大富认为，中央有全局部署，因为斗争刘少奇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是牵动全局的。“因为刘少奇不比王光美。斗王光美在六六年还斗不成，必须到六七年四月才行。”〔13〕《井冈山》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指出：“斗争王光美，是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战役，是彻底批判刘邓黑司令部的大战役，……斗争王光美，就是斗争刘少奇。”〔14〕其实，上述戚本禹的那篇文章发表后，蒯大富敏锐地意识到时机来临，他主动请缨，向戚本禹提出要批斗王光美，戚本禹回答说：“这事我决定不了，你

得请示总理。”〔15〕史料证明，蒯大富不迟于4月3日就向周恩来提出了上述批斗要求。周恩来4月3日给蒯大富回复了一个小纸条，用铅笔写道：

大富同志：

我回去问明情况，再由孙岳同志答复你电话。

周恩来 四、三。〔16〕

4月5日，蒯大富提出批斗王光美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同意的答复。

## 二、过程

1967年4月伊始，清华《井冈山》报加大了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为将要举行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大造声势。4月5日晚上，蒯大富宣布了“中央批准在四月十日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斗”的消息，〔17〕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两点要求：（1）不武斗；（2）要准备好。〔18〕井冈山兵团5日晚发出“关于四月十日揪斗大扒手王光美的通告”，这个通告说，戚本禹的文章是向刘少奇“发起全面的、猛烈的总攻击的进军号，宣判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死刑！”〔19〕，定于10日上午九点半在清华大学主楼广场举行这一大会，“热烈欢迎全市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革命群众参加斗争大会。”〔20〕看来，自一开始，井冈山兵团就把这一大会定为全市性的、数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批斗大会。该兵团制定了“斗王光美方案”，成立了六个负责具体事务的筹备组。〔21〕该兵团的广播宣传车自6日至9日连续在北京城区广播上述通告。7日晚，该兵团还举行了斗争王光美全校政治动员大会，还成立专门的“斗争王光美指挥部”。〔22〕《井冈山》报对这些活动和10日的大会都作了及时的报道。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主楼前的广场，〔23〕人潮人海，红旗如林，一张张大字报俯首皆是，一条条大标语格外醒目，一幅幅漫画随处可见，一声声革命战歌激昂嘹亮。〔24〕据《井冈山》报报道，全市、全国三百多个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席，几十万人参加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25〕大会主席台中央，矗立毛泽东的高大的全身塑像，两旁是巨大的毛泽东语录，上方悬挂“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和“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斗臭”的横幅标语。这一大会被称之为“一场震动全国、震惊全世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战役。”〔26〕另外，北京市有关部门派出1500名警察前往清华园，维持秩序。〔27〕

大会由井冈山兵团总部鲍长康（实为该总部第二号领导人）主持，任传仲（稍后成为该总部作战部领导人）代表该兵团总部发言，学生吴浩汀（蒯大富同班同学）发言控诉工作组，学生代表朱德义、干部代表王文兰、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革命群众的代表、原工作组组长叶林、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国裔专家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发言，蒯大富最后发言。后六人的发言在《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他们的发言题目分别为：朱德义：“把仇恨凝集在刺刀尖上”，王文兰：“戳穿王光美对干部的四条毒计”，桃园大队革命群众代表：“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恶”，叶林：“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李敦白：“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蒯大富：“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发言安排非常有代表性，比较有分量的发言就是蒯大富和叶林的发言。李敦白的发言最短。〔28〕

这一批斗大会不只是由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及蒯大富所主导，而且更是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一手掌控。戚本禹回忆道：“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

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29）

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仿佛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最大的公开的、集中的和密集的打击。因为，这次大会除了主要批斗王光美外，还把文革初期倒台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以及有关部委领导人、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领导人等等，共计三百多人，被带入会场前台，进行“陪斗”。这也表明，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绝不是只限于批斗王光美一人，也绝不是只限于针对刘少奇本人。这次大会给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众多人胸前套上了标有各自名字的大牌子（很多大牌子故意把名字倒过来写出，并在名字上打上了叉，以示侮辱），用文革初期流行的“喷气式”斗争方式（即迫使被批斗者低头弯腰，身后有两人架着被批斗者的胳膊）惩罚他们。蒯大富在其发言中不仅声讨了刘少奇和王光美，还直面痛斥了薄一波、蒋南翔。（30）

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的印象就是批斗者们逼迫王光美穿上了旗袍、戴上了项链和草帽，对王光美加以羞辱。随着当时王光美被斗情景照片的广泛流传，仿佛这场批斗大会就是为了让王光美大出其丑。（31）这一富有政治喜剧和文革闹剧的情节实际上源于1963年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几国时，在王光美着装问题上，王本人与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对于此事耿耿于怀，并由此而带来了恶作剧般的报复。

据蒯大富回忆：1967年4月4日，在中央的一次接见会上，蒯大富与江青、戚本禹隔桌对坐。江青对蒯大富说：“王光美去印尼穿那个妖精衣服，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戚本禹插话说：“她那些衣服都到哪去了？把它找出来。”蒯大富说是他回去告知井冈山兵团办公室负责人，让这位负责人去刘少奇家把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戴的衣服找出来，“在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上命令王光美穿上。”蒯大富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1971年8月受审查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中就承认：这一做法“丑化了这个大会。”（32）

据戚本禹的回忆录说：“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项链，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项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一样。总理不赞成，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没法向主席交待。”（33）戚本禹的这番说辞，既有可能把上述蒯大富所提及的戚本禹和江青的“出谋划策”推了个一干二净，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又是怎样使王光美穿戴上了那些东西。

据王广宇回忆：给王光美穿上旗袍，戴上项链和草帽，经过了江青等人，到王力、关锋，再到王广宇、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潘剑宏的大致的或谋划、或安排、或落实的过程。1967年4月初的一天深夜，王力、关锋从江青所在的钓鱼台11楼开会后回到钓鱼台17楼，关锋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交代任务：“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上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她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他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

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王广宇立即赶往清华，找到潘剑宏，布置上述任务。潘剑宏向王广宇解释，井冈山总部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用木制的项链，而是用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不重，不会伤及王光美的。王广宇再三叮嘱潘剑宏，提出让王光美穿上出国服装，千万不要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潘剑宏答应照办。次日，潘剑宏给王广宇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是王光美的衣服在王光美家里，怎样才能取出来？王广宇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只有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潘剑宏请示周恩来。当天晚上，在王广宇的帮助下，潘剑宏在人民大会堂，乘周恩来接见某省群众两派代表的间歇，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即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给王光美穿上出国的服装和配饰，说了一些理由。周恩来开始不赞成这样做，认为用这种方式不好。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上述要求，周恩来无奈，只好同意让潘剑宏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出她出国穿戴的衣服和行头。周恩来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江青的这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34）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述不同的回忆，就是为了表明只是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上为了羞辱王光美而逼迫她穿戴什么衣物和配饰这一个问题上，那些文革当事人的追述和评议是多么微妙和值得回味，甚至令人感慨不已！

据王光美回忆：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刘少奇和王光美认为这是一个严重信号。刘少奇当晚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4月9日午饭时分，刘少奇的儿女告知父母，外面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刘少奇非常不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还立下了自己的遗言，嘱托自己的儿女，他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大海里。4月10日清晨，清华造反派学生扣押了刘少奇、王光美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王光美。王光美做好了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带上。大约早上6点半，清华造反派把王光美押至清华大学主楼八层一房间里。清华一些造反派学生在那里“审问”王光美，并与王光美就一些问题争吵起来。他们逼迫王光美穿上她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戴过的衣服和草帽，并给她的脖子套上了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王光美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周恩来派了一位秘书，与王光美同去。到了晚上7点，王光美回到中南海。（35）当天晚上，那边，刘少奇在中南海家中悲愤得一口饭都没有吃；（36）这厢，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清华主楼前召开庆祝晚会。（37）

在批斗大会之外，清华井冈山兵团还对王光美进行了由任传仲主持的三次“审问会”。（38）该兵团下属的杂志《井冈山》专刊1967年8月10日发表了“三审王光美”的记录稿，三审地点都是在清华主楼八层建筑学系的803室里进行。第一次审问是清晨6点左右开始，第二次是批斗大会结束后下午1点，第三次是在下午5点多。在审问王光美的那一房间，围坐着数十位井冈山兵团挑选出的人员，四处张贴有标语等。审问者和与会者疾言厉色，怒不可遏，给王光美造成心理压力，他们还不时地齐声喊出阵阵口号。这三次审问主要集中在对于戚本禹上述痛斥刘少奇的文章的看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责任以及在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清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及干部路线问题、王光美个人的经历等等。王光美在这三次审问的表现的确不凡，可谓据理力争，并不示弱。戚本禹后来评价道：“王光美在批斗会上回答了红卫兵学生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都很得体、很巧妙。我都没有想到，一个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这样的才能，只是可惜她这个才能用错了地方。”（39）王光美的争辩有一特点，她始终坚持她与刘少奇从不反对毛泽东，不是什么反革命，她把审问者提出的诸多问题与毛泽东的主张或观点联系起来。今天再看这些审问记录稿，可以说，清华大学的“文革小将”们并没有真正“战胜”王光美。至少有一点，王光美在这一天的批斗和审问中，并没有完全屈服。这三次审问的部分记录稿后来广为传播。（40）

周采芹在其主演的反映这一“审问会”的电视剧《斗争之课》中，有一个细节很真实，她所扮演的王光美在步出屋外与清华学生争论时，她气得一下子坐在楼梯的台阶上，这与王光美当时经历的情景非常吻合，因为这一情景后来被井冈山兵团在有关报道中加以发挥。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据王广宇追忆，毛泽东、江青的女儿李讷（当时化名为“肖力”）“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41〕李讷“……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的旨意。”〔42〕江青实际上是“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43〕根据我对清华文革文献资料的查阅、对清华文革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蒯大富的专门采访，〔44〕都没有显示或没有证明李讷这一天到清华参加批斗会，是人们当时不知道李讷参加此会的“保密”，还是王广宇的上述说法根本就没有标示出来的基本证据？

“4月20日，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她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经过和4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报刊和造反派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作了申辩。信中流露出难以遏制的不服，说：‘我绝不是坏人，刘少奇也绝不是假革命或反革命。’”〔45〕王光美给毛泽东的这封信，至今都没有公布或发表。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制队摄制了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情景和过程，这部以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为专题的纪录片在完成后还不到十个小时就放映了，江青“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17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46〕可以断定，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或负责人们都会看到这部现场纪录片的。这部纪录片的一些历史镜头后来也被不同的历史文献影像所采用。

毛泽东对于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具体态度或具体反应（如批示），到今天都还没有发现文字上的记载或口述上的证明。

总之，1967年4月10日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以打击刘少奇为主，以羞辱王光美为主，这就必然带来了这场大会具有形式大于内容，闹剧成分大于正剧成分的特性。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酝酿、进行和结束中，不难看出，这一大会凝聚着整个文革初期历史繁纷复杂、异常浓厚而又刺眼夺目的政治格局及政治色彩。从毛泽东的统领全局、以小打大、以点治面到他对文革最大矛头对象的欲擒故纵、旁敲侧击、穷追猛打，从周恩来的忙于左右、两头为难、疲于应付到他的老到干练、办事谨慎、善于妥协，从蒯大富及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异军突起、得意忘形、力求复仇到他们的呼风唤雨、急功近利、玩尽权谋，从江青的颐指气使、睚眦必报、为非作歹到中央文革小组几位大员唯江青马首是瞻、低声下气、诚惶诚恐，从刘少奇的险象环生、日趋危急、坐以待毙到王光美的临危不乱、负隅反抗、绝不服输，等等，这一切都在这一批斗大会的背景和场景中得到了深深而又重重的映现。

### 三、影响

（1）批斗王光美大会，既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面决裂，特别是标志着前者对于后者的决绝斗争，也成为了自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所出现的一次最大、最广的批斗中共党和国家干部的大会，更显现了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中共党和国家的干部机制和干部势力在文革初期的总体衰退。这一批斗会很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参加人数最多、声讨阵势最大的批斗会。毋庸置疑，这一批斗会无论在规模、气势和格局

上，还是在特性、意义和作用上，都远远超出了整个文革历史在北京乃至在中国大陆所有其他批斗中共党、国家和军队等老干部的大会或集会。（47）

（2）批斗王光美大会可以真正算得上是文革初期的中共中央高层斗争与基层文革群众运动上下互动、交叉推行的一大结果。它不仅凸显着中共中央高层斗争利用或依靠基层文革群众运动而带来的文革模式的内涵，而且凝聚着基层文革群众运动促动或制约中共中央高层斗争而具有的文革运作的底蕴，进而映现出中共中央高层斗争与基层文革群众运动砥砺前行、磨合相依的文革生死场的气数。显然，批斗王光美大会，既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厢情愿的“孤鸣”，也不是清华井冈山兵团势单力薄的“独唱”，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椽笔谱写、清华井冈山兵团合力演奏的一首文革“狂飙曲”！文革悲歌一曲，狂飙清华从天落。

（3）批斗王光美大会实际上是蒯大富以及清华文革初期众多激进造反学生对于工作组以及王光美的反击和清算。从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到批斗王光美大会，大约经历了250天的时间。一方面，清华大学这250天的文革经历切实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诡谲横生，奇异多变；这一经历从文革基层单位的典型意义和独特功能上来讲，真正使得清华文革在文革初期的大舞台上独领风骚，无出其右；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同工作组所体现的传统的党的领导模式的对峙，正是由于同王光美所代表的刘少奇对文革的理解和运作的冲突，特别是在大半年里苦苦追求要在清华园里批斗王光美，蒯大富等清华激进造反学生以及稍后的井冈山兵团获得了他们在文革的巨大“政治资本”。（48）

（4）批斗王光美大会既不可能解决当时清华文革的矛盾和困难，也没有制止正在运行并即将发生的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内讧和清华文革群众组织的分裂。在这一大会之前，作为清华当时文革主干的井冈山兵团内部已经阴影重重，危机四伏，不同势力及其代表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在这一大会期间，该兵团“有人却拒不参加斗争大会。纵队派头头沈如槐、宿长忠、张雪梅等在颐和园开会，策划分裂井冈山。”（49）他们对批斗王光美及其大会根本不感兴趣，力求采取和实施与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有所不同的文革政策和文革主张。在这一大会之后，不到五天，“四一四串联会”正式出现，它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分庭抗礼，毫不相让。在这前夕，该总部还通过报刊痛斥那种“蒯派必须全盘否定！”的论调。（50）仅过五十天，“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宣布成立，它所造成的分裂和后来与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进行的决战，致使清华文革初期的历史驶入了一条无法逆转的黄泉之路。

（5）批斗王光美大会促使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走向和命运加速转化。上述那期《红旗》杂志发表的关于清华干部问题的文章，实质上引爆了干部问题这颗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一大“政治定时炸弹”。历史证明，蒯大富以及以他为首的井冈山兵团通过批斗王光美大会的方式只能力图“上扫”文革初期原有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重大文革对象，而不可能“下除”由文革引起，由工作组直接带来的清华干部问题。在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前前后后，对于以广大的中、基层干部为主体的原有清华干部队伍（当时他们已被停职或被解职十一个月左右），究竟是加以“除恶务尽”，还是“平反平黑”？究竟是使他们继续处于边缘化、局外化甚至继续遭受歧视、迫害，还是团结、使用甚至依靠他们？就成为致使蒯大富的文革政治生涯衰竭乃至整个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破败的一个死结。

（6）批斗王光美大会还带来了后人对于文革诸多问题的进一步审视或反思。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杨澜女士所主持的综艺节目（“杨澜访谈录”）中对王光美采访的视频。在王光美讲述自己的文革苦难经历以及在清华受到的屈辱等等之后，杨澜机敏而又直切地向王光美提出一个问题：你在“四清”、清华大学“蹲点”时冤枉没有冤枉过别人？王光美则以强调过去的运动造成人际问题很难讲清，不能再搞运动等等作出了含蓄的回答。（51）这一点



非常耐人寻味。总之，对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述评，尤其是对于这一大会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受害者和施害者而言，我所要继续追问和不断探寻的是如下的问题：谁是这一大会的胜利者？谁是这一大会的失败者？进而，对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文革的人们而言，有无文革的胜利者？有无文革的失败者？有无文革的清白者？有无文革的无辜者？最终，对于记忆和反思文革的人们而言，有无对文革的全面批判？有无对文革的根本变革？

注释：

1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543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关于毛泽东的这一祝酒词，有不同的说法：张春桥的回忆是“为全面内战干杯！”同上，第547页；关锋的回忆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同上，第548页；王力的回忆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同上，第550页；姚文元的回忆是“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同上，第553—554页。

2 同上，下册第602—606页。

3 同上，下册第607页。

4 给予王光美的这个称号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有关。“十六条”第七条的题目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条指出“要谨防扒手”。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第三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2014年。

5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60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6 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另外，张绛在其所著的《我所知道的王光美》第14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上说1966年10月19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说是他们二人一起来到清华，这不准确。

7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2，案卷号：0023

8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召见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参见编辑组编：《历史的审判》，第313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年。

9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6年12月22日第4期。

10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2，案卷号：0022

11 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0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12 1967年1月6日的“智擒王光美”行动是由清华六个文革群众战斗小组组成的“捉鬼队”发起的，30多人参加。他们于那天下午3点半到西单附近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先以座谈的名义把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萍萍控制起来，骗王光美出来，剩下的20多人到西单附近的交通队和市立第二医院，控制了12部电话机，在急诊室成立了指挥部，一些人扮成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谎称刘萍萍遇车祸受伤，王光美开始不信，派刘婷婷和刘少奇警卫员来医院看望。“捉鬼队”说服了刘萍萍，让她打电话把王光美、刘少奇叫出来。稍后，就把王光美拉回清华园批斗。

根据清华大学有关档案的记载表明，“捉鬼队”的这一行动事前并没有正式请示蒯大富及井冈山兵团总部（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

审查报告》，全宗号：2，案卷号：0022）。根据我本人2010年1月19日在深圳对蒯大富的采访，蒯大富证实，“捉鬼队”的领导人在这次行动之前只是给蒯大富打了个招呼，没有讲出具体的策划和步骤。蒯大富对于这位领导人的“招呼”，既不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否定，而是不相信他们能做出后来那么大的举动。无论怎样，“捉鬼队”的这一举动当时得到了井冈山兵团总部有关机构在使用车辆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孙怒涛先生2017年4月16日关于此事对蒯大富发出的微信求证，证实了这一点。

1967年1月6日晚8、9点，“井冈山兵团”总部广播台播出“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已被揪回，要全校革命师生立即去清华西大操场参加斗争大会”的通知。蒯大富等人当时在静斋总部会议室开会，包括蒯大富在内的许多总部委员事先并不知道此事。在斗争王光美时，王光美反问批斗者的一些问题，使这些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1月7日，井冈山兵团发行了《号外》，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智拿王光美，巧斗刘少奇”为题，报道了前一日捉王骗刘的经过。《井冈山》报1967年1月11日第9、10期合刊第5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追述1月6日“智擒王光美”的过程，并发表了题为《好得很！》的评论，有所指地斥责“那些生怕革命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政治庸人”，这种斥责后来被说成是“攻击周恩来”。这次批斗王光美一直持续到1月7日凌晨，王光美写出了“四点保证”后，被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带回中南海。在这次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期间，周恩来提出四点指示，一是同意让王光美检查，二是不要打她，三是不要侮辱人格，四是“检查后放她走。”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2，案卷号：0022

周恩来指责了这种“骗斗”活动。他在1967年1月7日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代表时，批评了这种骗斗王光美的行动，“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是背后耍鬼，这种作风不能提倡，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这是不正常的。”（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但是，《周恩来年谱》对仅过了三个月，蒯大富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一事，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只字未提。1月20日，“捉鬼队”贴出了《关于周总理一·七讲话的声明》，公开表示对周恩来上述批评的不满和指责。该队还把此声明分别递交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和井冈山兵团总部。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2，案卷号：0022

1967年4月10日，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上，蒯大富还给“捉鬼队”授予了一面锦旗，并让该队全体人员登台亮相。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2，案卷号：0023

13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2，案卷号：0023

14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8日特刊。

15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630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16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重要材料汇编（1967年1月23日至1967年9月2日）》，全宗号：2，案卷号：0252

17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8日特刊。

18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4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19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8日特刊。

20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6日第31期。

21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4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22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8日特刊。

23 看来，王光美并不记得或知道她被批斗的地点是清华大学主楼前的广场，错以为是“大操场”（黄峥执笔：《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第4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刘少奇人生纪实》下册第874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也错以为批斗的地点是大操场。

24 参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6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25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

26 同上。

27 唐少杰2017年5月5日在清华大学对蒯大富的访谈。

28 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之前，井冈山兵团总部办公室负责人潘剑宏向周恩来请示这一大会的方案，其中一条是不许外国人参加大会，潘剑宏向蒯大富转达这一条。蒯大富邀请了已是中共党员的李敦白参加，因为蒯大富未把李敦白当成外国人。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蒯大富交待材料（五）》，全宗号：2，案卷号：0216。

李敦白1940年代后期就在延安认识王光美了。参见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110页，林瑞唐译，台北，智库出版，1994年；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红幕后的洋人 李敦白回忆录》，第62页，丁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文革初期，李敦白是著名的“坚定的国际反修战士”，他曾在北京许多单位、部门作过有关文革主题的报告或讲演，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一文，参见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91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李敦白1967年4月初来清华园，与井冈山兵团部分人员座谈，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此《井冈山》用了两个版半的篇幅，发表了他的批判发言，参见《井冈山》1967年4月8日第32期，很可能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敦白收到了参加4月10日大会的邀请。十分有意思的是，李敦白在其后来的回忆录或文章中都没有提及他参加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并发言一事。

29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630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30 清华大学井冈山编辑部编：《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第二版。

31 1972年，侨居英国的周采芹女士（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的女儿），饰演了根据批斗王光美事件而改编的八集电视剧《斗争之课》（The Subject of Struggle）中的王光美。在周采芹著的《上海的女儿》一书中，译者把该电视剧名称译为两种：“斗争对象”和“斗争主题”，参见该书第211页、第274页。我以前也把该剧名称译为“斗争对象”，看过此剧后，我认为应译为“斗争之课”。参见周采芹著：《上海的女儿》，何毅华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上述电视剧由英国电视公司Granada's TV Production出品，制片人为Leslie Woodhead。该剧在英国以及一些其他地区播映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周采芹女士由于其出色的表演而获得英国本年度最佳电视剧女主角奖的提名。参见周采芹：Daughter of Shanghai, p163,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8。

32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2，案卷号：0023

33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630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34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202—203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35 黄峥执笔：《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第427—4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按照黄峥的此书推算，王光美那天在清华被批斗、被审问的时间似应为十二个小时左右，但是按照黄峥另外两本书的表述的推算，似应为十六个小时。参见黄峥编著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的第174页和黄峥编著的《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的第145页，这两本书都引用了“三审王光美”的资料，该资料标明那天第三次审问王光美的时间结束于晚间“10点零5分”。

36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165—16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37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6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38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蒯大富交待材料（三）》，全宗号：2，案卷号：0214

39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630—631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40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41—25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第161—175页，黄峥编著：《刘少奇冤案始末》，第130—14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41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180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42 同上，第181页。

43 同上，第180—181页。

44 唐少杰2017年4月10日下午对蒯大富的专门电话采访。

45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第14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46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181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47 这一批斗大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没有涉及文革之前和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解放军元帅和高级将领，诸如彭德怀、罗瑞卿、黄克诚、谭政、许光达、张爱萍、苏振华、赵尔陆、吕正操、刘震、吴克华、王尚荣、肖向荣等等，这可能与1967年4月之际或之前的文革形势有关。王广宇提及清华这次批斗大会的众多被批斗者中还包括罗瑞卿，王广宇显然是错了。参见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17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的《清华大学一百年》也记载这次批斗大会包括批斗了罗瑞卿，显然错谬，参见《清华大学一百年》，第28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48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82年11月1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蒯大富反革命案”的起诉书、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刑事判决书”，都没有把蒯大富参与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列入起诉和判决的内容。参见编辑组编：《历史的审判（续集）》，第154—158页、第177—18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49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6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50 社论：《决不允许转移斗争大方向》，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编：《井冈山》报1967年4月13日第35期。

51 杨澜访谈录·王光美（下），[http://www.56.com/u40/v\\_NDIOMDg2Mzc.html](http://www.56.com/u40/v_NDIOMDg2Mzc.html)。有的网站相关的同一视频（例如，[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wNjkyNjA4.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wNjkyNjA4.html)）节目没有我所提到的这一段对话，可能作了处理。

写于2017年4月清华大学校庆106周年日前夕

〔作者简介：唐少杰，男，1959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乱世悲歌】

#### 北大校友回忆反思文革诗选

• 舒声选注 •

#### ◇ 前言

近年来，北大校友在回忆反思文革时，不仅写了大量文章，而且写了不少诗词。这些诗词用凝练的文字，反映了文革那段苦难的历史，悼念了在浩劫中逝去的老师同学，也反思了造成这场劫难的原由和应汲取的历史教训。这些诗词，也应该是文革研究的一部分，有一定的价值。笔者从《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诗集》、《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和《未名湖畔——北大老五届微信群》中选编了部分有关诗词，以飨读者。

◇ 黄思明（无线电系1964级）：

#### ▲ 七律 伤

难抚红心遍体伤，十年生死笑强装。  
文攻武卫阎王闹，旧墓新坟冤鬼凉。  
破碎金瓯徒水盼，恶贫坡地枉耕忙。  
未安乱絮山河乱，此地立锥为故乡。

注：1970年本人下乡劳动锻炼的贵州兴义地区，山高坡陡，乱世满岗，基本都是望天田。

2013年4月1日

#### ▲ 七律 燕园文革

十年动乱未名呻，武卫文攻暗黑沦。  
反动权威跟屁虫，走资旧派保皇民。  
无罪革命罪难赦，造反争功反却贫。  
血雨腥风凄楚切，犹惊梦里未醒人。

2014年4月29日

▲ 七绝 兴亡

十年文革太荒唐，动乱下乡真国伤。  
多少渔樵谈笑事，人民万岁几兴亡。

2013年7月7日

◇ 侯碧辉（女，技术物理系1965级）：

▲ 虞美人二首

（一）四个面向

几年文革神州闹，国力天天耗。乱麻割断一挥刀。老九统通发配、都勾销。  
风霜打尽书生傲，天地无烦恼。码头工矿下煤窑。塞外边疆插队、苦逍遥。

注：1970年全国大学生四个面向（农村、基层、工矿、边疆）分配。

（二）往事回顾

几年乱世逐出校，苦闷愁难表。燕园两派战旗飘。日夜高音交响，甚喧嚣。  
最高指示何其妙，战斗催人老。古稀华发且闲聊，纷乱青春荒废、似烟消。

2014年5月

◇ 景小棠（女，技术物理系1965级）：

▲ 纪念1965年入校

韶华急促五十秋，旧影惊鸿忆旧游。  
领袖羽檄吹号角，燕园学业付东流。  
山乡劳教发敕令，洗脑改造号“反修”。  
偷洒酸泪双眼涩，未名塔影记忧愁。

2014年8月22日

▲ 蝶恋花 北大文革

韶华翕忽五十秋，  
遥想当年，燕园逞风流。  
惊世浩劫祸九州，  
学子莘莘学业休。

“军”“工”两队入驻后，  
革命小将，沦为“臭老九”。  
太上敕令吞泪受，

且步三闾后尘走。

◇ 谷世宁（物理系1963级）：

▲ 忆文革有感 致《良知的拷问》作者孙怒涛

痛定思痛哀国殇，劫后余悸仍迷茫。  
欲起沉疴复康体，难赖旧药换新汤。

2014年7月

◇ 刘向晴（地质地理系1963级）：

▲ 读《告别未名湖》有感

（一）

频过凶年乘漏舟，燕园首祸惹人愁。  
未名湖畔刀光影，博雅塔前风雨稠。  
且有闲暇批水浒，绝无韵致读春秋。  
神州劫后伤心在，追忆文成伴泪流。

（二）

湖光水起塔风生，血雨吹毛夺路行，  
鼓角夕闻烽火举，喇叭夜噪梦魂惊。  
儒冠儒服委丘壑，房柱房梁改牖棂。  
且喜青山烧不尽，春风吹过漫坡青。

2014年9月

◇ 申家仁（中文系1965级）：

▲ 题蒯大富聂元梓合影

惺惺相惜两枭雄，借势走红犹梦中。  
跌宕人生留史鉴，何须腆面炫龙钟？

2017年08月31日

▲ 题蒯大富聂元梓合影之二

骤起黯销疯魔梦，遭逢荣辱异有同。  
青葱半老皆幡首，浩劫余渣共镜中。

2017年09月01日

◇ 郑振卿（历史系1964级）：

▲ 蒯聂合照 依家仁韵

难忘劫波两顽凶，犹记当年曾峥嵘？  
沉滓泛起寻常事，汹涌长河总向东！

◇ 吴在庆（中文系1965级）：

▲ 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感赋

史家绝唱续前贤，实录燕园内外篇。  
五届师生皆受难，九州民吏尽牵连。  
严霜暴雪梅魂在，鬼火妖风柏骨坚。  
沧海桑田鲁难已，喜看弃子力扬鞭。

2014年8月26日

◇ 臧振（历史系1963级）：

▲ 汪篒去世四十年祭

历史系汪篒先生是北大文革中第一个以身殉道的教授，1966年6月7日在家中服毒自杀，6月10日去世。

红羊无计逃劫火，刍狗有灵待君说。  
我觅一行醒世语：为人不可太执着。

注：红羊，古时认为丁未年是容易发生灾祸的年份，丁属火，未属羊，故称红羊。指国家或个人遭受灾难的岁月。

2006年7月

◇ 王智钧（化学系1965级）：

▲ 《未名诗稿杀青感赋》

李杜文章在，未名诗稿新。  
神州遭劫难，学子祭青春。  
博雅流风韵，红湖映本真。  
九千魂魄聚，七十数年轮。

2015年8月5日

◇ 樊能廷（化学系1963级）：

▲ 次韵王智钧《未名诗稿杀青感赋》



曲水文章旧，传邮发稿新。  
神州多磨难，学子失青春。  
博雅持风韵，心潮映本真。  
集诗宗五届，白士鄙朱轮。

◇ 张从（技术物理系 1963 级）：

▲ 和智钧、能廷兄

“告别”三集在，诗篇承续新。  
十年度劫难，古稀忆青春。  
博雅多风韵，神州少本真。  
尚余妖孽子，螳臂挡车轮。

◇ 黄思明：

▲ 步韵智钧及诸位

文革耳犹陈，惊看世纪新。  
燕园曾血泪，博雅几伤春。  
歌哭笑为假，诗狂泣作真。  
未名湖告别，中国梦回轮。

◇ 周大晨（化学系 1963 级）：

▲ 步思明韵

浩劫向谁陈？才人出自新。  
未名曾怀旧，姊妹莫伤春。  
实证应缥缈，虚无辨假真？  
诗痴思梦蝶，振翼可回轮。

注：“告别”三集指北大老五届校友编写的《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1—3 集，诗稿指《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诗集》

◇ 张从（技术物理系 1963 级）：

▲ 忆北大文革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北大爆发武斗，持续 120 天，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财产损失。至今已有 42 年了。

噩梦依稀咒孽源，燕园四十二年前。  
腥风卷起武斗旗，血雨染红女皇冠。  
为争自由多壮志，敢靠民主写新篇。  
闲看今日未名水，悠悠往事俱如烟。

2010年3月

▲ 悼陈显强学长

北大历史系62级陈显强学长近年来数度从羊城来京，组织收集北大文革史料，拟编辑出版，今忽驾鹤西去，材料尽失。

感君数度至京城，携手同心共继绳。  
壮志未酬身已去，十年编史叹难成。

2016年4月2日

▲ 再悼陈显强学长

十载集文事未成，子规啼血字殷红，  
君今驾鹤长留恨，当世谁为太史公？

2016年4月5日

◇ 周大晨：

▲ 步张从《再悼陈显强学长》韵

一卷春秋书未竟，万千资料血殷红。  
出师未捷悠悠恨，舍子谁当直笔公！

◇ 张从：

▲ 读朱开定学瑶能廷回忆周培源先生文章有感

白发盈颠一老翁，燕南园里立奇松。  
丹心耿耿迎激浪，铁骨铮铮顶恶风。  
学贯中西成大业，志存天地系民生。  
当年教诲今犹记，难忘师恩不了情。

注：周培源先生文革时期敢于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专制行为，铁骨铮铮，毫不屈服，赢得广大师生尊敬。有奚学瑶、朱开定、樊能廷等写文记述。

2016年7月18日

◇ 白玉林（数学力学系1965级）：

▲ 读郝斌书有感

流水何曾洗是非，秋风萧瑟叶不飞。  
燕园风云未名水，半世情缘似梦归。

2016年8月21日

◇ 张从：

▲ 和玉林读郝斌老师书有感

青史应能辨是非，师恩深重恨难飞。  
当年学子应知悔，喊话隔空唤尔归。

◇ 黄思明：

▲ 续读《流水何曾洗是非》

流水何曾洗是非，滔滔浪拍听声悲。  
十年祸害应清算，开放当该破陋规。

注：郝斌，原北大历史系教师，文革中被江青钦点为反革命分子，文革后平反，曾任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有《流水何曾洗是非——记北大文革牛棚》一书出版。

◇ 张从

▲ 读郝斌师《流水何曾洗是非》二首

（一）

已经半世梦初归，青史应能证是非。  
小丑跳梁成腐草，侍师长者伴春晖。

注：郝斌书中记载：1966年秋北大历史系文革将20多名教师关押于太平庄劳改，66岁老教授向达已患重病，54岁教师阎文儒侍师如亲。

（二）

断崖夜半斗人桎，打手蛇蝎费几番。  
夜半扪心知悔否，恩师白发泪枯干。

注：监管人员高某某半夜将杨人桎教授拉至断崖边批斗，扬言将其推下，并曾打骂周一良等。北大百年校庆时高某某将其论文送周先生作序，周先生宽容大度原谅之。

2016年12月24日

◇ 张从：

▲ 读樊能廷兄“三院门对实地考”

燕园三院仰古风，一幅门联挂正中。

领袖亲言更一字，鬼神贱肤剥三层。  
教师著述怀前事，学子书文道悔情。  
青史遗痕岂敢忘，留于后世永心铭。

注：文革初期，北大历史系学生黄申章在三院历史系门口贴一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后被伟大领袖改为“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许多人借此对“牛鬼蛇神”进行了批斗。黄申章在《告别未名湖第三集》中表达了悔恨之意。樊能廷亲自到实地进行考察。

2016年12月26日

◇ 吴根耀（地质地理系1963级）：

### ▲ 沁园春 忆北大文革

才别雁城，就听“宣言”，回马拭枪。  
斗“三村”“四店”〔1〕，打趴权威，搞臭走资，揭批黑帮。  
触及灵魂，腥风血雨，“六一八”〔2〕全校沸扬。  
数小丑，煽风燕园夜〔3〕，蛇蝎心肠。

为推百校登场，赴全国，声援点火忙。  
看一门师友，不绝派仗；高音喇叭，昼夜嚷嚷，文攻武卫，  
刀枪围剿，“四二六”〔4〕学子遭殃。  
离校日，把酒无言处，满目凄凉！

注1：三村指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四店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注2：1966年6月18日，北大发生在38楼门前批斗大批干部教师的情况，被工作组制止，后上报，被定为6.18反革命事件。

注3：1966年7月25—26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到北大东操场，主持全校大会，宣布工作组撤出，点名聂元梓筹备校文革。

注4：1968年4月26日，为攻占和保卫36楼，北大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不少学生被迫离校，躲避“战乱”。

2014年9月6日

◇ 徐枢（数学力学系1965级）：

### ▲ 也谈文革

颠倒黑白乱象悲，谈微色变眼低垂。  
文攻武卫安知对，破旧标新搅是非。  
壮志豪情成戏剧，丹心碧血化烟灰。  
未名滴泪人嗟叹，罹咎十年祸首谁？

2014年冬

◇ 姚成玉（又名姚莹，历史系1964级）：

▲ 牛棚题照

羸下廿三春，征衣杂战尘。  
立新连日夜，播火伴星辰。  
喷气摧心碎〔1〕，炸雷震耳闻。  
期平囹圄恨，为国建奇勋。

注1：系指被扭起双臂，再按下头的所谓“坐喷气式飞机”的体罚方式。本人在工宣队入校后被打成攻击江青的反动学生，关入牛棚批斗，但并未屈服。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后获平反。

1968年10月

◇ 姚成玉：

▲ 接平反通知喜作

嘉讯飞来喜欲狂，蜗庐把酒庆沧桑。  
沉冤昭雪人含笑，玉宇澄青花吐香  
但愿霜松拔地起，岂容风竹向隅藏。  
笑揩囹圄十年恨，骧首云途万里长！

1977。10 沈阳

◇ 余元钱（哲学系1962级）：

▲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二书读后

忆昔燕园事，幽思滚巨涛。幸登高学府，亲炙大文豪。  
谁料风云乱，皆沦水火熬。珍珠撒荒野，桢干杂蓬蒿。  
路自荆榛辟，渡凭舟楫操。虽今沐娇日，惜已染斑毛。  
感彼二书著，成人一字褒。晨昏披座右，万里逐鹏翱。

2014年12月23日

◇ 张从：

▲ 五子歌

著名学者高放教授在《告别未名湖（2）》序言中把老五届大学生概括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被作为“棍子”，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甚为贴切。读后感慨万千，遂作“五子歌”。

少年负笈入燕园，天之骄子志不凡。  
未名湖畔书声朗，博雅塔下舞蹁跹。  
导师诲人真不倦，同窗情谊更无间。  
精研学业勤锻炼，鲲鹏蓄势待冲天。

孰料阴风吹校园，未名湖水卷狂澜。  
被封小将当棍子，障目难辨忠与奸。  
造反批判斗牛鬼，文攻武斗大串联。  
妖孽成灾压群众，兄弟阋墙结仇冤。  
飞鸟已尽良弓弃，学子发配离校园。  
雾满深山家何在，雪封莽原路难前。  
更有英才遭狼噬，长使亲人泪不干。  
可怜骄子成弃子，岁月蹉跎十数年。  
十月金风摧枯朽，除却四害尽开颜。  
明珠拂尘放异彩，青春焕发再争先。  
杏坛执鞭育桃李，科研献身谱新篇。  
改革开放弄潮儿，北大才子谁比肩？  
春风秋月匆匆去，云卷云舒等闲看。  
回首往事多反思，赤子之心似火燃。  
奉献余热力不减，追求真理志弥坚。  
莫道夕阳桑榆晚，遥看赤霞尚满天。

2014年12月

▲ 沁园春 入学四十周年

人事当秋，似水年华，不再回头。  
忆峥嵘岁月，燕园信步，未名戏水，意气吞牛。  
馆内读书，湖边高论，誓为中华争自由。  
香山赴，更攀登绝顶，见鬼无愁。

谁知雨骤风稠，教热血一腔付水流。  
看硝烟四起，文攻武斗；昔时学友，竟作冤仇。  
十月金风，摧枯拉朽，绝处逢生再运筹。  
重聚首，且相逢一笑，互指白头。

2003年9月

◇ 张杰（中文系1964级）：

▲ 忆入北大及文革（节选）

白云出函谷，少壮赴古都。黑土发新翠，青色入碧湖。  
湖清可濯足，园静宜读书。雏鹰奋羽翼，粪土封万户。  
关西多异男，朗月破云出。北国有奇松，虬枝出陇亩。  
同学三十三，风云会京都。俱怀济世思，云帆待海曙。  
花样年华好，五湖百姓苦。雾霾四野合，凄雨五更酷。  
奇祸酿红墙，浩劫吞大陆。荒唐三千六，罪恶五二五（1）。  
未名失颜色，博雅倾玉柱。五四倡民主，武斗沦派奴。  
可怜云中雕，魂惊神无主。夜黑风雨狂，膀折身心缚。  
仓皇辞燕园，惨淡别父母。哀鸣声凄凄，流徙水复复。

注1：“荒唐三千六，罪恶五二五”，指文革十年，始于由康生投毛泽东之所好、授意聂元梓等人炮制并于1966年5月25号抛出、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所谓“五·二五”事件。不应忘记，“五·二五”是北大历史上奇耻大辱、罪恶深重的一天。

◇ 郑振卿（历史系1964级）：

▲ 读郝斌师《流水何曾洗是非》感怀

一部牛棚史，读得心内惊。六月燕园里，陡然起恶风。  
尔雅皆不见，凶残竟公行。师长成牛鬼，蒙羞遭血腥。  
忍辱被俯首，含愤望长空：良知何处寻？是非谁断平？  
人性俱扭曲，人格最心疼！事近五十载，警钟可长鸣！

2014年3月

◇ 王智钧（化学系65级）：

▲ 《风雨未名湖》序言三首

苍黄天地裂，风雨未名湖。博雅遗长恨，迷茫赴险途。  
大师成鹤的，鱼目扮珍珠。桃李青春误，稀年叹白驹。

赤子遭魔障，燕园蒙耻羞。腥风污禹甸，血雨袭红楼。  
站队分天地，同窗视寇仇。三生惊噩梦，岂可再回头。

离散天南北，相逢已白头。湖边怀故树，塔下忆红楼。  
聚啸山林止，盘桓社店休。九回肠欲语，一笑泯恩仇。

注：《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收入北大老五届68位作者74篇文章。

◇ 部分校友悼念沈达力同学诗选

沈达力，女，北大中文系1962级学生，上海人，父母皆为大学教授，本人才华出众。1967年因“反对中央文革和校文革”，受到北大校文革和中文系的拥趸组织迫害，于3月17日夜服来苏水自杀于北大游泳池红湖岸边。2017年张从等主编的《风雨未名湖》一书中刊登潘泰泉文章《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沈达力的离去》，文后附有北大校友悼念沈达力的诗选。

▲ 礼庆贵：悼念沈达力校友

风雨摧残多少花，无穷无尽恨天涯。  
瓦存玉碎实难度，俗世却将冰剑夸。

▲ 黄思明：步礼庆贵韵

血雨腥风谁葬花？尘霾雾瘴浊无涯。  
自由独立被“文革”，万岁人民不敢夸。

▲ 张从：和庆贵、思明悼沈达力校友

辣手狂摧姐妹花，腥风血雨岂无涯。  
冰洁玉碎成灰烬，何处冤魂不恋家。

▲ 周大晨：有感 和庆贵、思明、张从诸兄

岁月荒唐手段邪，风狂雨暴戮鲜花。  
不堪再拭当年泪，多少冤魂未返家？

▲ 王智钧：悼念沈达力校友

未名湖畔泪，风雨袭芳华。玉碎谁怜念，香销何处家。  
孤魂萦母校，长恨寄天涯。人性良心泯，红潮孽恶虾。

▲ 侯碧辉：悼念沈达力校友

临湖轩静寂，博雅塔无言。暴雨凌雏凤，乌云压校园。  
女儿难尽孝，天地可知冤。脸变同窗恨，香销乱世喧。

▲ 杨碧莲（东语系1964级，女）：悼念沈达力校友

芙蓉遭雨恨凋零，瓣瓣化泥悲愤天。  
棘手摧花人性恶，孤魂冷月弃湖边。

注：沈达力死于北大红湖边。

▲ 郑振卿：悼沈达力校友（新韵）

燕园未相识，有幸睹芳姿。风狂璞玉碎，犹记无言时。  
当年兴恶者，可曾悔罪失？芳华音容在，痛史几人知？

▲ 卢达甫（中文系1964级）：悼沈达力

学姐沈达力，你我不相识。惊闻香魂殒，心悲有余悸。  
学弟尚懵懂，疑惑胸中起。十年风雨后，头脑渐清晰。  
弱女抗邪恶，悲壮惊天地。女杰今何在，魂魄飞天地。  
魂去浩气在，长留我心里。

▲ 姚兴元（中文系1962级）：悼沈达力

越赳未忍到红湖，达力轻生竟何辜？  
非因才女多命薄，至今忧恨两妖狐。



再悼沈达力

五十年来未献花，为能相助恨无涯。  
也曾二院施微敬，有歉人前未敢夸。

小注：沈达力轻生前那个晚饭时，我去大食堂打饭，看见大字块写着“打倒猛虎团长沈达力”，一抬头，看见她从饭厅出来，她看到我，非常惨淡地苦笑一下，我知道她内心十分痛苦，想找她谈一下，安慰一下，但由于私心作怪，怕别人误以为乘人之危，也没想到她竟轻生，就未去找她，故至今犹悔。我想当时若找她谈一谈，也许就不会那么快就轻生了。她的骨灰在二院院里时，我曾移入走廊，盖上报纸。有人劝我写一写，我总觉得遗憾太重，无可言说。

~~~~~

【往事非烟】

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

• 岳瑞民 •

一、武斗开始了

1967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武斗”阶段，几乎每天都有各地红卫兵组织发出“告急”“惨案”“流血”“求救”的消息。特别是7月20日，武汉部分红卫兵组织绑架了中央代表团首长。更为严重的是武汉军区有部分军人也参与其中，而且还携带着真枪实弹。这种“军变”加武斗的形势，威胁到毛主席的安全。

7月20日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革委会”，也就是红卫兵组织，上街游行，支持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武汉事件的指示，谴责武汉部分造反派的反革命罪行。北师大当然也参加了。当我们的游行队伍走到西单时，突然天降大雨。人人都淋得像落汤鸡。我们冒雨前进。

刚过了中华门，快要到天安门广场时，突然队伍前边传来领队的命令：全体男生跑步前进！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撒起丫子一路狂奔。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广场上已经停放着很多大卡车。只听领队说：赶快上车！于是大家急忙爬上大卡车。一队长大卡车载着满满的红卫兵，离开北京火车站，急速驶到了永定门火车站。卡车还未站稳，领队就喊：上火车！凡是军人一律抓捕！

我和同学们，不，是红卫兵战友们，急速登上火车。只见车厢里没有一个群众乘客，每个车厢里都坐着一些军人。他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哭丧着脸，坐着不动。据说他们本来是携带武器的，在我们赶来之前，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已经缴了他们的枪。我们冲到他们跟前，第一个动作就是撕掉他们头上的解放军帽徽和衣服上的解放军领章，接着两人一组负责一个，将他们的胳膊拧到身后，扭送到大卡车上。有个别的军人不服，赖在座位上不下车，甚至还有要打架的。这还了得？！红卫兵们几个人一起上，连拉带拽，硬是从窗口塞出去，按到卡车里。时间不长，战斗就结束了。

把这些军人拉回到学校的学生食堂，喝姜汤，吃晚饭。战斗了一天，还真饿了。我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吃大喝。可是那些抓来的军人，一个个似残兵败将，有的愁眉苦脸，有的

哭泣掉泪，也有的脸红脖子粗，气呼呼的不吃饭。驻校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首长见状，就问一个梗着脖子不吃饭的军人：“你是党员吗？你是干部吗？”答：“我是党员，排长。他们（指我们红卫兵）把我们当敌人似的抓起来。我想不通！”首长说：“你是党员干部，就要听党的话，带头吃饭，有问题以后再说！”这位干部只好端起碗来吃饭。

据说当天夜里，这些被我们抓来的“俘虏”就被北京卫戍区押到高碑店，办“学习班”去了。

实际上，这次抓捕解放军战士的战斗之前，我们已经有过一次“演习”了。好像是1967年的春天吧，北京还冷。有一天，学校革委会用汽车将我们部分红卫兵送到了人民大会堂，说是中央首长接见，召开会议。大会堂里外都有解放军把守。进了大会堂，到了会议厅，才知道不光来了我们学校，很多大学的红卫兵也来了。北京各大学的红卫兵一律坐在二楼。不一会儿，会议厅的一楼就坐满了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内蒙古的红卫兵。他们是对立的两派，都是来北京找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来状告对立派的。所不同的是，其中有一派是由当地的部队战士陪同而来的。为避免冲突，从内蒙古来的这两派红卫兵分开坐在两边，中间有通道隔离。

可是这些红卫兵还未坐稳，我就看见一派红卫兵的坐席上站起来一个军人，身穿四个兜的军服，可能是个军官吧，大喊一声：“我们走！”这派红卫兵呼啦一下子就往会场外涌。原来在他们座位上都放着一张纸，是中央关于内蒙古“文革”形势的通告，其中批评了有当地部队支持的红卫兵组织。

他们哪里能够出得了大会堂？！很快又返回会议厅。返回来后，也不坐下，而是齐声的大喊：“我们要见党中央！”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才知道叫我们来的用意了。于是，北京各大学的红卫兵也齐声喊起来：“请安静！等待中央首长接见！”

过了一阵子，主席台上的顶灯突然亮了。只见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江青等首长走出来。台下反而更乱了，喊得更起劲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这样喊了一阵，好像周恩来总理也生气了，声调严厉地说：“我们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就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们的！”大家一看总理生气了，于是安静下来，开会。

后来听说，从内蒙古陪同一派红卫兵来北京告状的这些军人，当晚就被北京卫戍区武装押送到北京以外的某地办“学习班”去了。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红卫兵造反的矛头便开始指向“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开始掀“军内一小撮”的运动了。

## 二、受命赴南京掀“军内一小撮”

### 1，《声明》支持“八二七”造反派，谴责南京军区“一小撮”挑动武斗

1967年7月末，物理系革委会派遣我去南京，任务是“调查南京‘文革’形势”。与我同去的还有三位同学，因为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就用他们的籍贯代替吧。一位是湖北同学，任组长，一位是江苏同学。我们三个都是65级同学，平时都认识。还有一位是高年级的，不太熟悉，但知道他是老资格造反派。

我们一行四人坐火车到达南京。因为南京已经发生多次武斗，公交车都停开了，所以从下关火车站只能一路步行。进入南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法国梧桐林荫大道。嚯，大路两旁各一行法国梧桐树，树干粗壮，树身高挺，枝繁叶茂，树冠被修整地向马路中间靠拢，遮天蔽日，马路上几乎不被阳光晒到，全是荫凉。

当天住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宿舍。因为一路劳顿，所以虽然似觉身体不适，以为是蚊子骚扰，也未在意。次日早晨醒来，浑身奇痒，一看，天哪，脸上、背部、胸前、腿上、胳膊上，到处都是红包，呈一串串状，原来昨晚我们做了饿极了的臭虫的美餐！

开始“调查”。所谓调查，其实就是到各个大专院校和一些知名的中学去，这里边不仅设有南京各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宣传站”，还有外地各派红卫兵组织的“宣传站”和“联络站”。他们都热情地接待我们，介绍自己组织的情况，南京的造反斗争的革命历史和自己组织的光荣发展史，还有武斗的情况，特别是南京军区对待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态度。然后塞给我们大量的油印材料，铅印的也不少。

经过一整天的调查，晚饭后我们就在宿舍讨论分析南京的革命形势。基本上有两点共识：第一，南京的红卫兵组织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简称“红总”，另一派简称“八二七”。这两大派都自诩“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为“保皇派”，而且都控诉对方血腥镇压自己。第二，南京军区似乎支持“红总”派，排斥“八二七”派。两大派都拥有武器，据说都是从军区抢来的。但是“八二七”派信誓旦旦地说“红总”的武器明里是他们“抢”的，实际是军区“送”给他们的。

既然我们四人的看法相同，于是就考虑向学校红卫兵总部回报。这时，老资格同学说：我们应该发一个“声明”，支持南京造反派，揭露军区走资派。组长湖北同学说：“我们是来调查的，能公开表态吗？”老资格同学说：“我负责与学校作战部联系，你写声明。”

晚上，老资格同学说，已经与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好了。湖北同学就拿出他起草的声明叫老资格同学看。老资格同学看后说：“这不行，太缺乏战斗力。我来写。”他连夜写好了《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驻南京联络站关于南京局势的声明》。内容大致是：1.“八二七”是革命造反派，“红总”是保皇派。2.南京军区以许世友司令、杜平政委为首的一小撮军内走资派，支持“红总”，武力镇压“八二七”，是南京多起武斗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印刷厂印刷《声明》。这个印刷厂，是我们来南京后的当晚无意中路过，向他们了解情况，刚好他们就是“八二七”派的红卫兵成员。于是，《声明》很快就印刷完成。我们几个就上街，到各个大专院校去张贴、散发。据说一时轰动南京。

过了几天，我校物理系革委会某委员带领一伙红卫兵战友，从芜湖赶过来了。据说那里被保皇派控制，局势紧张，为躲避武斗危险，就转移到南京来了。这位领队携带有井冈山红卫兵联络站的公章。我们这四个人自然就归他领导指挥了。

## 2，没有亲眼看见武斗

说实话，1967年从7月到9月，南京发生过多次武斗，据说两派都有死人。但是我连一次武斗也没有亲眼看见。只是有一次看见武斗大军，倒是让人开眼。

大概是7月30日前后哪天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在街上溜达，突然许多卡车轰轰隆隆的开过来。卡车很多，一辆接一辆，排成一长串。每辆卡车上都站满了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几乎都一样：头戴工人生产时戴的柳条编织的安全帽，身穿一般工人常穿的那种蓝色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脚上穿的是翻毛皮鞋，左臂佩戴红卫兵袖章（没看清是哪一派），手里握着用铁管或者三角铁制作的长矛。啊，一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一脸视死如归的神情。

卡车队伍飞似的驶过。我们知道这是要去参加武斗了，于是赶紧追上去。可惜我们几条腿没有汽车轮子快，不一会儿就看不见车队的影子了。只好不无遗憾地回去睡觉。第二天，就听说昨晚在下关火车站发生了武斗，而且有人死亡。

### 3，中途返校汇报南京斗争形势

我的新任务是和化学系的一个女生共同搜集整理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就是各红卫兵组织印发的传单和大字报。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以前的，很多重复，也有新近的。我们把最新的信息整理、摘录出来，汇编在一起。

8月份，我曾经返校一次，向学校革委会作战部汇报南京的斗争形势和联络站的工作。

我提着一大包资料上路了。因为武斗，路上没有公交车，只好步行去火车站。当我走到将近挹江门时，突然一声凄厉的警报声响起，“呜——”，非常惨人。我抬头一看，大街上本来就不多的行人都急慌慌的四散逃跑，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再看城楼上，似乎没有一个人，但是那恐怖的警报声分明是从城楼上发出的。我知道，坏了，赶上要发生武斗了！怎么办？返回联络站？说明自己是个胆小鬼，这太丢人。往前走？小命还要不？犹豫不决。我站在树荫下，仔细观察城门口洞口的动静，发现还是有几个人急匆匆的进出。于是，我心一横，牙一咬，硬着头皮闯过去了！

火车上挤满了红卫兵，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多亏我有座位，否则从南京一直站到北京可不是好玩的。火车开动后，我很快发现车上没有卖吃的。肚子饿了，忍着吧。大概到了晚上10点以后，饿得实在难忍。听有人说抽烟解饿，可是我不会抽烟，身上也不带烟不带火。没办法，腆着脸向别人借了一支香烟，硬是抽了一半，还真管用，好像不觉得太饿了。

过了午夜，肚子又开始抗议了。这可怎么办？还真好，这时火车停在了一一个小站。火车还未停稳，就看见几只又黑又粗糙的手从车窗外伸进来。我探头向外看去，好几个人，多是妇女和老人，他们每人都提着一个小篮，小篮里放着苹果、梨、鸡蛋等食物。这些食物装在用细线编织的小网兜里，每个网兜里大概装两三个吧。无论哪种食品，一网兜卖两角钱。

于是我花了两角钱买了一网兜三个鸡蛋。几口就吃完了。还是饿，但是兜里没有钱，就只好将就吧。旁边的旅客说，这些人都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家里实在穷，拿这些农产品卖几个钱，就可以买点粮食或者生活日用品。白天有村干部拦截，碰上就会把东西没收了，他们不敢来，只好在夜里偷偷摸摸地来卖，即使这样也要提防干部在半道上偷袭。

午夜之后黎明之前是人最困的时候。我起来去厕所，怎么觉得屁股上有凉风吹过。走进厕所一看，天，原来裤子的屁股处破了一个大洞！家里穷，1965年我来北京上学时，穿的那条裤子，是我妈妈用她自己穿过的半新的女式裤子（开口在一侧）改做的。因为没换洗的裤子，所以这条裤子很快就磨得快露底了。来南京后，因为天气太热，反正裤子也烂的够呛了，于是我就把两条裤腿剪掉，改成裤衩了。没想到在车座上这么一磨，从裤腿几乎烂到

了裤兜，形成一条大口子，所以裤裆里感到漏风。不过幸好我里面穿有小裤衩，要不从南京到北京，真丢死人了！

这次回到学校后，向“井冈山”作战部部长周耀文汇报了南京的情况，把在南京搜集的资料交给了作战部，为了说明南京的革命斗争形势，我还手绘了一份“军事形势图”。

◇ 后记：

10年以后，“文革”结束了。大概是1977年吧，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派了一个老师，找到我的工作单位，调查我们当年在南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有关谭厚兰的罪行。我把能够记起的情况如实讲了，也说了我只是一个角色，始终没有和谭厚兰接触过，不知道她的事。来调查的老师拿出一张纸，叫我看，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原来是当年我手绘的那张“南京革命形势图”。于是我哈哈大笑起来。调查老师说：“你笑什么？”我说：“当年很幼稚很荒唐，还绘制什么‘形势图’，俨然以为自己是一个‘军事家’呢！”

说明：本人主要目的是自责，不想牵连其他同学，故文中有意隐去了其他同学的姓名，请谅解！

2012年7月首发《人民网—强国博客》

2016年4月30日刊登《记忆 REMEMBRANCE》第154期

2016年11月发表《新浪博客》

〔作者简介：岳瑞民，1945年7月11日生，山西省垣曲县人。196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山西省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从事教师工作，直到退休。〕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